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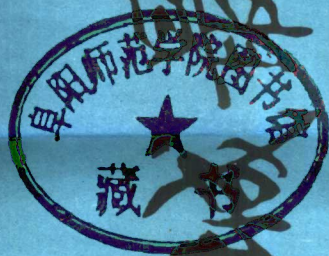
顾乡 著

我面对的 倾城最后十四天

1993年9月24日——10月8日

顾乡·著

我面对的



顾城最后十四天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八日)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代 序

编者、作者问答(一)

编者：岳建一

作者：顾 乡

岳：去年10月8日，顾城伤了妻子谢烨后自杀。顾城死后不久，谢烨也逝于医院了。这件事情，至今世说纷纭，其反响和深远影响，我认为难以在近几年结束，甚至本世纪内也不会终止。不仅仅因为事发突然，也不仅仅因为谣传说传四起和种种说法不一，更不仅仅因为顾城曾经卓有建树，影响超越了国界。我认为：顾城在艺术的领域里，无疑是一个天才，他的一万多个诗、文、画、童话、演说辞，是他生命的巨大精神创造；这些精神财富是属于人类共有的，不应因后来发生的悲剧而把这一切也抹杀掉。顾城夫妻的悲剧本质是精神的悲剧；顾城的死亡是某种精神绝境中的死亡；顾城是精神的人。造成这一悲剧的空气、水土乃至人文环境还在，但是，顾城没有了，

谢烨也没有了。这一切绝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发生的突变。可是,许多人还来不及弄清真实情况,还没有意识到这对曾经相濡以沫而又才华横溢的夫妻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告诉了我们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匆匆忙忙开始了非此即彼的道德评判。没有比这种仓促的评判更容易的了。您远在国外,可能也略有耳闻。我不想掩饰我对有些人们对此事件发生以后所做的简单的评判的不以为然,遗憾和惋惜。道德属于精神范畴。任何真正的精神世界都是丰富复杂、气象万千的,更何况顾城、谢烨这样一对有着极端精神追求而离群索居的夫妻。法律评判可以参照条律,非此即彼。但是,包括道德在内的任何精神评判,都应该以事实和真相为依据,来不得非此即彼,匆匆忙忙更不利。至于有些骇人听闻的夸张,随心所欲的编造,我在国内也耳闻目睹了不少,各种说法互相矛盾,相去太远。应该说,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评判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评判呢?游离事件真实的评判,只能遗害社会,扰乱视听,给后人和研究者们添上一些遗憾和麻烦。古往今来,澄清不了的史实太少,只是时间的早晚。我看不必这样短视。只有真正弄清最基本的事实,才能据此去烛察事件的本质,才能多少做到对历史负责。我之所以选编了您的这本《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是希望能让读者知道事件真实经过和原委,同时,也给历史留下一部真实的、至少有重要参阅价值的书。这正是我编辑这本书的初衷。

您是顾城的姐姐。您对谢烨的深厚感情,我也是知道的。您在两个人生命危机而又一息尚存的时候,把唯

一的氧气瓶给了谢烨,而不是给了您的弟弟顾城,对此,我一直是怀有敬意的。更重要的,您是唯一的现场目击者。在众说纷纭的报道中,至今没有您这位唯一的现场目击人和唯一的事件经过知情者的声音。您介绍的情况,对今天,对历史,都将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您这本书的特约编辑,我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您回答,譬如:事发初始,国内引自外电的报道,已经把一件事说清楚了,就是顾城是先死的,是在谢烨还活着的时候自杀的。而有的新闻媒介说成是“劈开”“脑后正中”,“脑浆流出”,“十几斧”,“满地浑身是血”……如果真的像有的“知情者”说的那么邪乎,谢烨岂不当场就丧生了吗?直至今天为止,一些报刊还在继续着“杀死妻子后自杀”的说法,这是不够严肃的。自杀在“前”或“后”,性质会有区别,对于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基本的真实情况,是不能被忽略的。同样,说顾城“杀妻自杀”也不够准确,谢烨当时受了伤,不治而逝。我想,我和读者们一样,想从您这里知道比较准确的情况。顾城生前最后一刻,究竟是重伤了妻子,还是杀害了妻子,甚至“蓄意谋杀”了妻子,我希望听听您介绍一下情况。

顾: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心痛的同时,我实在非常地痛恨我的弟弟,后来很多天里我还持续在这个恨里,以至送他去火化时都没掉一滴眼泪。这种恨一直持续到我找遍理由骂他,也没办法继续恨他,只有恨我自己为止。我为他的罪行震慑,尽管如此,在我最初读到“杀死妻子后自杀”,“杀妻自杀”时,还是惊愕了一下。倒不是因为顾城的罪行被加重了,而是因为它的确同我经过的情况不

符。当然相对当时已经发生的残酷事实，我不会在意这微小的误差；人死不能复生，修正任何误差也改变不了这一铁打的结局。

那时他们的每一字音、每一神情都锋利如刀，在我一跳一疼的心上不断地划着，我不能不一字字地记，反省每一瞬间是怎样地从我眼前过去的。似乎每一个瞬间都该有方法让我再介入一次，只要一次，我一定可以抓住那一瞬间；抓住任何一个瞬间，就可以不让那个结局到来。我终日终夜干瞪着那一个个活生生的瞬间，想不通我怎么就让它们竟然一个不剩地全都过去了，那都该是伸手就抓得住的瞬间呵。只因为有一个瞬间是最后的，所有瞬间就会霎时冰冻住，任你泼血泼泪，也永无希望化解一分一厘，让你死死地握一下了吗？我那时候，想又想不通这件事，我被钉死在最后一瞬间上，越不过去，其他的事极难思考。记者是我不懂如何对付的，我不想从我这里向报刊发出一个字。我知道这件事里有着很深的很痛苦的缘故，但我不想说，也很难说得出来。人既已都死了，任何说明、陈述，都让我觉不到意义。可是没想到真有人像您说的，还嫌这个结局惨得不够，还嫌顾城错得不够，要自发冲上去出谋划策并且恨不得帮忙“劈”、“砍”几下才过瘾似的，把从惊险电影里看来的越是恐怖血腥越是痛快的镜头一个劲儿地往“事实”里放，种种奇怪的杜撰也同时源源而出；我渐渐觉到如果我不把我眼前过去的那些时刻切实地记述给公众，就将是我的新的不负责任了。

顾城先死这点，对每一个评说顾城的人是应该注意

到的，因为这同“我死就要先杀了你”以及“蓄意谋杀”的推论是很不同的。顾城去自杀的时候，的确没以为自己做的是杀，也的确没想到谢烨会死；我丢下顾城见到谢烨的情形我在《记略》中写了：当时烨俯卧，除了接触地面的右额周围发现了血外，其他地方和平常一样干净；顾城自杀身死之后，医生看到谢烨时还说：她会好的（She should be right）。顾城是在自认“打了”谢烨后自杀的；如果没有那一打，他会不会一定自杀，并不能肯定。他写遗书时是打算“见”儿子“最后一次”之后自杀的，那至少对于他还有几个小时的一段时间；其间必要经历一些事情；会不会被什么因素干扰，使他改变主意放弃自杀，都是未知的。

顾城自幼怕见任何打的场面，更不要说杀了，他的胆子是很小的；小时候电影上一放打仗，他就禁不住要跑掉，直到不打了才回来。他总是远远躲开人群，不是真正给逼住，从不会有暴烈的行动。他可以在哲学上面对一切，但在现实中，他什么也面对不好。他被他做的事震慑，苛刻待己的天性使他此时唯一能想的只是如何立即处死自己；他对谢烨对亲人的责任心都还在，可他乱了套，他没法想清怎样做才会好些，他奔死就去了。他是以身殉罪的。

我们评判自己尽可苛刻。但评述他人，哪怕评述一个罪人时，也当尊重事实、恰如其份。对顾城，对谢烨都该公正。

岳：我知道新西兰和许多国家没有死刑。可不可以冒昧地问一下，如果顾城没有自杀，或自杀未遂，他会被判多少年

刑呢？

顾：这真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我也不懂刑法。这个问题对顾城是没有意义的，顾城为打了谢烨就立即死了，不要说真听到谢烨的噩耗了。

他们都在的时候，我指的是顾城、谢烨去德国以前，报导中新西兰判刑的宽容常成为我们的话题。记得一次我们议论起一条报道，一个男人击杀了在家里聚会的九个人，逃跑二十天后被捕获，后来只被判了七年刑，原因是说他当时正处在盛怒之下。对于那件事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平常人们对这个男人的心情和精神状况关心得太少了，以致弄出了这样的惨剧。当时和现在新西兰法律对各种原因的杀人罪规定的最高判刑限是十五年。顾城会把这类事当件事情说说，但与他最后决定去死与否没有关系。有一件事曾经让顾城提出坐牢——当时岛政府让他们七天之内把他们养的二百只鸡处理掉，否则罚款。这让他和谢烨不知该怎么办。后来顾城问是不是可以以自己去坐牢顶替。

顾城只会在这种时候考虑坐牢的。如果是杀人，即使判他无罪，他也必要同样杀了自己。

岳：新西兰法庭对这件事是怎样调查和结案的呢？这方面的传闻也颇多；还涉及到评说监护权的问题。

顾：对这件事法庭依据的只是最初的调查材料。比如对我的询问，就只有事发当天的那一次，当时我脑子疲惫茫然、心死如灰，问一句答一句，说了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并且我当时还完全不知道大×三十小时以内就将飞抵奥克兰，谢烨本预定同她的弟弟一起在机场接他以及等等

事情。我当时只有一个生理上的盼望，就是赶快不要继续问我，放我静一静。我以为以后还会有多次询问，但竟就再也没有了。法庭似乎认为没必要把情况了解得很细。

今年二月法庭以家庭纠纷做结了结此案，介绍了所掌握的情况，没有提出刑事谴责。当时我正在北京，是别人转达给我的。我以为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类似这样的事件和结论，在我们众所周知的日常生活中该不算罕事，国内有国外也有。仅在这件事发生后，在我知道的不大的人群里，就有两起相似的事件发生，只是都发生在新西兰白种人身上。两对夫妇都很年轻，一对留下一个孩子，另对留下了两个孩子。对这样惨痛的事件，稍有头脑和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感到，总是伴有很深入很具体的尚不被人知也很难被人知的痛苦原因和过程的。人们将心比心，表示深深的哀痛；还很少见拿出怎样的谴责和痛骂的姿态，并加之种种想象出的恶行，以持续进一步的谴责和痛骂呢。我的确很难理解这个现象，我很难体会得出这是出于善意和正义的。

确定孩子和财产的监护权在新西兰法律上同议论事件中的是非毫无关系。对于孩子，法庭考虑的是父母的遗愿和放在哪里更有利于他的成长。至于说财产监护权，那是在我意外地收到一份文件后才想到要去问问的。我们问的是一位岛上的律师，律师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说：“这个问题不复杂，所有财产将由顾城的亲属为孩子监护。”我很惊讶，问为什么。律师说：“因为谢烨先死了，而顾诚是后死的。”我说：“错了，是顾城先死的。”律

师很惊讶,说怎么可能呢?“他不是杀死妻子,然后自杀的吗?”我说谢烨没死他先死了,谢烨是死在他之后的。律师说:“那么顾城先死,顾城一死他的财产就过给谢烨了,将由谢烨的亲属为孩子监护。”跟着律师查了查法典,说顾城除了他的文稿、版权以及与他的工作直接有关的物品外,其他财产都将经由谢烨传给孩子。又说如有遗嘱则照遗嘱办。与我同去的先生问:“如果顾城让妻子死了再自杀,或者根本不自杀呢?”律师毫不犹豫地:“那财产就由顾城继承了。”我说这法律真是够简单的,只管谁死谁不死、谁先死谁后死。

五月底,新西兰法庭正式将顾城财产(内容即依法律规定)的监护权给了我,我和我父母将为木耳监护它直到木耳成年。

岳:有一位楚客先生,说也是位诗人,也是来自新西兰,还是顾城的熟人,从顾城的生前到顾城的诗文,予以了不少抨击。他介绍的顾、谢死时的情况耸人听闻。甚至顾城平时戴的帽子也被他在报上详尽地批评了。我倒觉得顾城的帽子挺有趣,可以各有偏爱嘛。

顾:这位楚客先生,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徐××,并且说我曾有幸见过他一次。在我初到新西兰的当天,这位朋友(当时他还只是顾城、谢烨的朋友,直到顾城,谢烨离世后才成为我的朋友)很忙,便请他的朋友,也就是今天我才知名字徐××替他开车拉谢烨去机场接的我;于是我记起了那是一个清瘦、沉郁的年轻人。那天谢烨再三谢了他,并且告诉我,谢他是因为此前并不认识他;后来我再没听谢烨或任何人提起过他,更不要说

他有可能是顾城的熟人了。朋友现在告诉我,说他是杨×先生的弟子,杨×先生确是顾城的老朋友,也许因为杨×先生的缘故,顾城、谢烨就有可能偶尔无意也碰了他几面,朋友说他同顾城也许说过十句话都不到。

他难耐“谎言陷阱的困厄”以“良知说话”,用楚客笔名写成的文章可惜我只找到些片段读了。他说到顾城的帽子,顾城的帽子有什么可说的呢,顾城就是喜欢老有那样的一顶帽子罢了。说是表演,是哗众取宠,可他在家里也一直戴着;在这个你获了诺贝尔奖也无人宠你的岛上,他又几乎不迈步离家,他表演给谁看呢?走进公众场合,会有人好奇地问起,为了不使人扫兴,为了增添一点风趣,他会即兴做个回答,也不是不认真地,也不是全认真地,如此而已。说他会“泪如雨下”,连他眼睛会湿一下我也不信;回答这样的问题,他只会是笑着的。“帽子”使顾城感受到“北京”和“家”,也再自然正常不过,他在家信中也说过,根本扯不上表演问题。

小时候,他学用缝纫机,有一次就那么轧了一圈儿,之后他就戴在脑袋上,照照镜子非常高兴。和谢烨结婚后,彼此叫起了新名字,谢烨叫他“可罕(可汗、可安)”,他想起了幼时的那种帽子,于是做了顶戴上。谢烨看了很开心;后来还不时为他做一顶。他总是在家戴着。在国内时他出门是不戴的,因为他知道人们都很循规蹈矩。出国后他便几乎无时无刻不戴着了。他和谢烨都喜欢他戴那种帽子的样子,如此而已。

岳:楚客先生还提到两年多前新西兰奥克兰的一次晚会。说那个会上,顾城已丧失自信,走向衰落,写不出新东西

了,说他后来自杀与此关系密切。我一向认为,或高尚或卑劣的目的,只有通过或卑劣或高尚的手段实现,我不想对楚客先生的言行予以评价。我想以后的时间和历史自会评断。我对顾城也曾经有过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是实事求是和负责任的。对不起,恕我直言,顾城毕竟是悲剧事件的责任者,这也是我的批评之一。作为一个诗人,顾城是天才的,他给世人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丰厚的。他这样说过:“我要完成我命里注定的工作,用生命来建造那个世界,用那个世界来完成生命。”这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曾经使我本人有过长久的感动。无论对这一信念做怎样的评价,顾城毕竟为这一信念努力过,也曾经感染了谢烨。他们双双为此奋斗过。顾城在自己创造的艺术世界里,恪守信念,以有限追求无限。公道地讲,在这个艺术世界里,我看到的是一个艺术朝圣者、殉道者的执拗和勇气。我倒觉得,顾城死在他艺术上成熟的高峰期,这尤其令人遗憾。用他临自杀前留下的遗书中的话讲,“现在创作达高峰,出口成章”。他的艺术创作,从早期的关注社会,到寻溯生命的本源、流向与归宿,到在形而上的精神王国里突进,到探索灵魂的内核,到用童话王国的净土负载抽象的哲思,步步深入。他的近作,如组诗《城》,再如《激流岛画话本》,都是他在后期时创作上的珍品。这一切,都使诗歌境界获得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概括性与深远性,一种面向未来的特质,一种宽广的文化视野,一种堪称悾悟的明慧。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平庸诗人,能唤起人们的许多已有感觉,似曾相识。天才诗人能发现人们从未经验的感觉,如梦

初醒。顾城正是这样的天才。我还说过，顾城临终前的长篇小说《英儿》，是绝痛，更是绝唱，有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辉煌，一种洞穿情欲世界的冷峭目光，一种意识到人自身虚弱的聪明，一种心理现实与外在现实、精神感受与肉体感受的灿烂交合。因此，拥有巨大的审美容量，足以留给未来世纪的人们进行审美再创造。顾城的创作，从关注社会到关注生命和灵魂，是一种递进，一种文化精神的超前和必然。他太强大也太脆弱，在艺术上达到最高峰时，弃自己“命里注定的工作”而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损失和顾城一同带走的都是什么，我想，有那么一天，会有人有和我相同的意见。我对顾城有过的全部批评中，最深重的批评莫过于弃工作而去。我是痛心的。我更痛心的，是我们有些人在批评顾城的错误时，连同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也要抹煞。楚客先生在那个晚上竟然就能感到顾城的创作已走向衰落，足见那个晚会非同寻常。请问那个晚会是怎样一回事，您知道一些吗？

顾：楚客先生指的只能是1991年在奥克兰东方市场一些有兴致一起说说玩玩、吃吃闹闹的当地华人们即兴搞起的那次中秋晚会了。晚会的热情的组织者之一就是后来告诉我楚客先生名叫徐××的那位朋友。这位朋友当时想让顾城去添点儿热闹，顾城想着这位朋友是真心帮助过他的好人，就去了。其实任什么活动也不会使顾城乐意离开家离开岛的，丹麦的学术邀访他就拒绝了，后来去德国他也是走得十分勉强和痛苦的；他怎么可能在这样一个以逗乐为目的、与诗与文学全然无关、随便谁都可以去凑凑趣的散漫的华人聚会上丧失信心、走向衰落

呢？顾城人对对场面，向来是不分高下大小，一律诚恳待之的；尽管他完全知道晚会上的人全无体验诗的心思，他依然朗诵得很认真，同他在欧洲、美国大的学术性诗歌活动上的朗诵没有两样。不想这也会被楚客先生琢磨成文章。

顾城 1992 年 3 月同谢烨离开岛，之后在欧洲的一年半里，无论主观上的创作还是客观上的机遇，对于他都是非常完满理想的，他的确处在事业和创作的高峰期上。回到岛上以后，他脑子里恨不得装着一百本书，只希望有种方法可以一下把它们倒出来。他是不喜欢那时候死的。他做了对他可以说是最大限度的忍让和最顽强的自我抗争，但仍然没能闯过布置在他面前的那一时刻；这同时也和他没能得到我的最起码的帮助关系重大。

岳：看你的《记略》，明显觉出你是负疚的。可以谈谈你写这篇记述的情形吗？

顾：前面说过，事发后我记他们留在我心上、脑中的声音，我被杀着，头发丝、指甲盖儿都哭，眼里的泪却流不出来。我记，只是害怕有一天会淡忘。最痛苦的事，总是最该属于自己的。何况在这件事里的并不是我，也不是顾城一个人。我没有打算要对公众述说这件事。

最初我甚至连他们死了都想瞒住父母。第二天晚上这里的电视新闻提了一下，我才猛醒到瞒不住的，才问来问去想问出一个北京熟人的直拨电话，想让我父亲在给我打一个电话的时候从我这里知道。我以为对父母只须设法安慰，细节没必要说的，从此这也就只是我脑里、心里的事罢了。我没想到一下说得到处都是。我在岛上

比较闭塞，真正感受到这种状况已是两个月以后了。本来清清楚楚就在眼前过去的情形，怎么到了端端正正的报刊上变成了各种陌生的样子？而且我的名字也不断出现，说那些古怪的情形是我说的，或是我看见的。起初我也没有很在意，以为说上一阵儿就会过去。今年年初回到北京，看了三年没见老了十三岁的父亲、老了得有三十岁的妈妈，说了许多话，也没忍心细说这件事，连顾城的遗书都是过了几星期才拿给父母的。在街上走走，不但看到报刊，还看到了集成集的书，我没想到人们关心这件事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是唯一最后从他们面前走过的人，我只能把我经历的写下来，我觉得无论是怎样一个不尽人意的过程，也还是只有讲给大家听了。

我在二月初开始动笔。母亲精神状态很不好，我几乎只能在晚上写；而我也早已感觉心力交瘁。我翻开我的记录和我那十几天里的日记，我就那么地开始写了，心又在刀上走，字字流血，就像看着他们一样，却是永远也看不见了。没能写完的时候，我病倒了，发了多少年没有过的高烧，我担心我是否能够坚持写到底了。三天之后又写，最后一个字了结，我感到怕是再多一笔也要写不动了。那时已是三月初，离再度离开北京的日子只有十天了。离京前我把这篇记述留在了一家杂志社，后来听说没有刊用，被转到另家杂志社，之后又被转；辗转中一些热情的读者忍不住增删改动了一些字，我得知时已面临发表期无法再改回来了。我希望这次在书中的登载能够保持我文字的原貌。

这次登载我又补进了一些内容，主要是初写时有意

略掉的涉及“英儿”的内容。初写时想到不宜太长，又精力不足，许多地方写得是很简略的，这回也补详细了些。但仍叫“记略”，是因为时间、精力依然不足，仍然没有写详尽。而且为了尽可能少地影响被涉及的人，还是特意略掉了一些内容。

岳：顾城是怎样一个人，可以简单说说吗？不少报刊把谢烨说成是长期以来受虐待、被欺骗的，包括她的母亲也这样说。我一直很吃惊。您是顾城的姐姐，不妨谈一谈。

顾：谢烨在去年9月18日回答记者曾慧燕相似的问题时说：“他（指顾城）性情率真，不懂世故。”谢烨在10月8日她最后的文字中说顾城是“一个忌恶如仇又天真烂漫的天才”。应该说到那时止所有来自顾城的“虐待”“欺骗”谢烨都已经历过了，但她却这样评说顾城；我想那些说“欺骗”“虐待”的人是该想想这个简单的问题的。要我说顾城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顾城第一不会欺骗人，第二不会虐待人，并且他对待自己一定是最苛刻的。顾城留下了许多作品，从诗到文到画儿，把他的精神和心灵显示得已很明白；如果真想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只要悉心去读，就会有体会的。

岳：可以谈谈“英儿”的情况吗？

顾：我写了篇文字，“读《命运的劫难》——写给李英”。我实在是因为太气太惊讶了才写的，我想不出李英会这样说谎，想不出一个人竟有可能光天化日下这样说谎。李英在她的文章发表之后还跟我通过两次电话，还给我来过封信，话说得婉转莫测，凄凄惨惨，当时因为我还不知道她的文章，所以只顾同情她心境的“混乱”和“惨痛”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希望我一向的好心和得过且过，能够救她。她一直没有对我说她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当我终于从朋友处知道后，我中断了和她的联系。去年10月8日后，她给我来了信，之后有信有电话还见了面。但自今以后决不想同她再有联系了。因为这篇文章本是写给报刊的，又由于时间精力不够，全文写得简略了些，暂且只有这样了。

岳：李英的那篇文章，我也看到了。文章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她是超尘拔俗的，以此说她“爱过”的顾城不超然。其实，超然不超然并不重要，也很难绝对，关键在于是不是用一颗真诚的心活在世界上。我和顾城有过一些交往，他的性格有些地方确实和常人不同。他看起来腼腆、口讷，一脸的孩子气，可是演讲起来，滔滔雄辩，无论听众怎样激动，他也不动声色，冷冷的声音里有一种穿透性的力量。我在一次学术探讨会上讲过，他是我迄今见到的最具魅力的演说家之一。我很难想象，这种演说竟会是来自他那样瘦弱单薄的身子。每次回想到顾城，我自然感受到的，就是他的温和、率真和宽厚。因此，悲剧发生以后，我一直不解。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是那种希望人们和世界都好起来的人，是一个柔弱而又有着爱心的书生。我理解他感受中的“世界与我无关”，是说功名利禄和由此生发的人世纷争与他无关。

顾：顾城自小，心就是很热的，也许因为太热，就变得很不好意思。小时候，好吃的不多，他不管从幼儿园还是哪里得到了，总是留给我，如果我想让他吃，他就会一下很急，有时还会一下很凶。他最怕见欺负，背着脸假装镇定、没